



主编

余庆安

何洪亮

中外文学与文化论集



责任编辑 黄丹丹

封面设计 吴俊卿

ISBN 7-5623-0682-6

9 787562 306825 >

ISBN 7-5623-0682-
G · 136 定价 : 16.00

中外文学与文化论集

主编 余庆安 何洪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学与文化论集/余庆安,何洪亮主编.—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1

ISBN 7-5623-0682-6

I. 中… II. ①余…②何… III. 文化-世界-文集 IV.G112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发行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202@scut.edu.cn

<http://www2.scut.edu.cn/press>

责任编辑: 黄丹丹

印 刷 者: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50 千

版 次: 2001 年 11 月出版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言

徐真华

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职责一是教学二是科研，当主编将收入本书的文章送给我看并要我作序时，我为老师们的辛勤劳动而感动，并高兴地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想。

在我看来，大学的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知识教育，这种教育是在中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把知识提升到专业水平层次，我们通常把这种教育称之为专业教育；另一个是人格心灵教育，这种教育是在人的生命意识本性的基础上，将心灵提升到精神崇高、人性完善的层次，我们通常把这种教育称之为人文教育。前一种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后一种重于精神价值。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已不再停留在一般意义的物质结构层面，而是人自身的心灵。因此，对于人来说，心灵的教育，人性的完善，属于终生教育的范畴。而在大学阶段，人文教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人好，什么都好”的格言，实质上就包含了人文精神是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础的真理意义，直到今天，这句话还是人们衡量人才的起码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出版无论对于专业教育还是人文教育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情。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大致在三个方面：中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每个

作者以自己多年教学和科研的积累，就其中自己感兴趣的某个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在中外文化背景基础上，研究的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有的文章是对基础理论问题做分析，有的文章是对教学问题做探讨，还有的文章是对实际工作做研究；既有精细玄妙的抽象思维结晶，也有贴近现实层面的实践应用研究。统而观之，这些论文都具有在科学上求实求真的特征，求实是从实际出发，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是符合客观规律，有真理的价值和意义。求实求真，既是高校教师人格精神的体现，又是专业素质的反映，集中起来就是高校教师清雅纯正的形象。从收入本书中的文章看，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从教学中寻找科研课题，以科研推动教学进步，二者相辅相成，老师们在备课、讲课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了问题，经过梳理材料，上升为理论认识，形成了有水平的科研论文，其中有些探讨教学环节、教学方法的论文，对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具有指导性意义。

我和本书的作者们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虽然和老师们所从事的学科专业不一致，但对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一样深知其中的甘苦，一样享受着生命的自由愉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任，人的现代化被看做是现代化中的“最后觉悟之觉悟”，教师同样也面临着在现代化进程中提高素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读完了老师们的论文后，写下了这些想法与大家交流，并以此为序。

2001年7月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目 录

试论春秋行人辞令的艺术特色	陈彦辉	(1)
生命的挽歌	张 瑾	(14)
诗画本同源	蒲丽钿	(26)
试从《夷坚志》论笔记小说的特点和成因	赖婉琴	(36)
《狂人日记》思想局限质疑	梁传豪	(44)
“熟悉的陌生人”	方尤瑜	(53)
“虚实”理论与中国电影艺术	刘海玲	(60)
禅宗思想与禅宗的美学意义	余庆安	(68)
论古希腊哲学家的快感与美感发生理论	伍方斐	(77)
风格传达与几个对子的处理	王渤海	(84)
论“基础写作”教学中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吴 琳	(97)
关于应用文写作教学的两个建议	何少轩	(104)
报刊文章标题使用冒号刍议	杨英耀	(109)
酒·诗人·企业家	雷镇祥	(119)
卖产品？卖企业？	郭海鹰	(128)
广告的语言美	陆佩鹤	(136)
粤方言区中的两个问题	李惠娟	(146)
The Darkling Thrush and the Ecstatic Nightingale	周 芳	(152)
诗有崎径意为先	刘世举	(159)
The Character of Harry as I See	刘胡敏	(164)
谚语的阐释	冯光武	(171)
汉语请求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	丁 凤	(180)
略论综合英语教学中交际法的运用	杨怀祖	(193)

如何有针对性地训练并提高学生对外台新闻的听写及理解能力	焦 敏 (199)
试论英语专业写作课教学与创新意识的培养	何洪亮 (207)
《大学英语》精读教材中文化教学方法初探	彭保良 (214)
《大学英语》精读课的口语教学活动探讨	张丽莲 (220)
Aspects on Learner-biased Classroom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陈林汉 (229)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in a Counselling Situation	李子容 (260)
Promoting Quality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by Motivating Students Attending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 Survey Course	余卫华 (278)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Dictionary Use on Vocabulary Retention	何家宁 (303)
Some Points for Attention in the Translation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黄群英 (314)
《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精确新闻之研究	高 堅 (321)
Children Should Be Protected from Media Influence	赵一农 (347)
What Lesson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rnet Can We Draw from the Record of Previous Technologies?	杜慧贞 (362)
Differences in Reporting for Aud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e Survey of Xinhua News	王 珂 (376)
“帮”的功夫刍议	赵蓬 目光 (388)
建立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模式	袁长青 (39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蔡方云 (401)
探索广外大发展的模式	黎佑均 (408)
将市场机制引入教材建设的思考	丁春玲 (413)
后记	(418)

试论春秋行人辞令的艺术特色

陈彦辉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和滥觞时期，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出现了诸如孔子、老子、孟子等许多伟大的人物和《诗经》、《楚辞》、《春秋》等流传千载的不朽之作，成为后人汲取营养的源泉。

在王权衰落、霸政更迭的时代，一个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群体——“行人”逐渐凸现出来，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他们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左传》从历史出发，艺术地记录了春秋时代行人的优美辞令，行人们技艺高超的外交辞令，对于我们了解那个特殊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人的心灵世界，理解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左传》里这些行人优美的辞令及其独特魅力，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文学借鉴。因此，我愿以对行人辞令的研究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以就教于方家。

周王朝灭殷而建立政权后，封建诸侯，制礼作乐，形成天下一统的局面。随着平王东迁，西周这一被孔子誉为“郁郁乎文哉”的辉煌时代终于成为过去。历史，正走入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春秋时代。此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已被破坏，周天子渐渐失去了征召天下诸侯的力量，权力下移，诸侯国已各自形成独立政权，各

行其是，轮番称霸。

经济秩序的改变，政治结构的重组，军事格局的变迁，似一阵疾风横扫整个春秋社会。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人伦道德的丧失已是必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充满亲情、温柔敦厚、人伦至上的世界消失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准则再也约束不了人们的行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春秋一代，子弑父、臣弑君之事史不绝书，过去尽善尽美的伦理道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与此同时，过去被人们奉为圭臬的“大公无私”的为家族利益献身精神和对他人负责的“忠、信”等道德准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伦道德的丧失和社会最高精神的失落，造成了春秋人心中价值尺度失衡，人们无法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作出美丑、善恶等恰如其分的评判。道德的衰落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不再对大同社会、礼仪之邦的理想社会孜孜以求，代之而起的是对实力和实利的大胆追求，于是各诸侯国凭借国力粉墨登场，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霸主争夺战。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先后出现了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主。霸主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与权威，大力征伐，使小国依附、大国屈从。一时间，像郑、鲁、许、卫、蔡、陈这样的中小国家终日惶惶不安。陈、蔡就是被楚国几经灭而复立的小国。郑国夹居于二大国之间：从晋，则楚讨；从楚，则晋伐。郑人无所适从，只能惟强是依。混乱的时局使春秋行人应运而起，他们凭借三寸之舌，奔走于千里之国，使得小国在困难的处境下终能生存。有的失而复国，有的国富民强。大国之争，也因此而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

行人，又称“行李”、“行理”，即现在的外交使节。它本是由大夫担任的一种专门职业。《周礼·秋官·司寇》载：“大行人，

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工，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小行人掌邦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朝人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2]可见，行人一职出现很早，本是宗周迎待诸侯宾客之官。《周礼》虽仅从宗周角度叙述行人一职，没有提及各诸侯国，实际上，春秋时期，随着王纲解纽，西周宗法制的衰落，诸侯国实力增强，各诸侯国由周王朝属国地位渐变成一独立主权之国，亦需具备行人之官，以交往各国。所以，行人已成为专职，但有时也可由国家执政大臣或王室重要成员兼任，如郑国执政大臣子产就多次出使他国，周王孙满也曾应对楚国问鼎。

春秋行人一般都是世袭的。这在《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左传》昭公元年记楚国会盟诸侯，鲁行人叔孙氏也参加了。而与此同时，鲁季孙氏没有征得楚国的同意就带兵伐莒，楚以鲁违盟扣留了叔孙氏。叔孙氏说：“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出”便是游走列国间承担外交使命，“叔出”二字便可说明叔孙氏乃为鲁国世袭的专职行人。又如，晋国的华员氏、郑国的子张等都是专职行人。在早期，行人只起到沟通各诸侯国或上传下达的作用，到了春秋时代，由于诸侯争霸，弱小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使命已不限于信使的范围，而是承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春秋行人奔走各国完成使命主要依靠的工具就是辞令。唐刘知几说：“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3]他们根据具体的形式采取适当的策略，选取不同的言辞以应对诸侯，精彩文雅的辞令成为春秋行人克敌制胜、保家卫国的法宝。因此，行人是否善于辞令，对于他们完成使命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陈，以备三恪……夏氏之乱，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辞。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表。今大国多數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详。”乃受之。

陈本是晋的盟国，而郑国侵犯他，晋人当然不满，所以想借此刁难郑人，以找到制裁郑国的借口。晋人责问郑人三项罪名：陈何罪被伐；郑何故侵犯小国；子产何故戎服。如果子产的回答稍有不慎，不仅自身性命难保，就连郑国也会遭到不测之祸。然而子产毕竟是春秋时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知识渊博、能言善辩，面对晋人指责，他从容不迫，引古论今，对答如流。不仅责备了陈国的忘恩负义，也巧妙地讽刺了晋人掠夺他人土地以自强的本质，使得“士庄伯不能诘”。赵文子因“其辞顺，犯顺不祥”而免问郑之罪，且受陈之献。孔子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哉！”^[4]

实际上，不但晋为霸、郑入陈，有赖文辞之功，而且整个春秋时期的外交斗争，都有“非文辞不为功”的因素。《左传》中有许多信赖行人辞令而使国家转危为安的事例：《左传》僖公三

十年，强大的晋、秦联军围攻弱小的郑国。在这武力悬殊、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郑国就是靠了烛之武力陈利害的辞令，说退了秦军，使晋秦联军瓦解而转危为安。僖公四年，齐率诸侯伐楚，楚屈原刚柔相济的辞令使齐人不得不无功而返。宣公三年，楚子（楚庄王）攻打陆浑之戎后，在周的边境陈兵示威，意欲取周之鼎。在王孙满一番有关“德”的长篇大论之后，楚子自觉天命未改、德行不厚，只好悻悻而退。

春秋时代，即使两军对垒、兵刃相接时，也有借辞令使对方握手言和、偃旗息鼓的。《左传》宣公十二年，“摄叔献麋对鲍癸”，使晋鲍癸收兵，放摄叔与乐伯回楚。昭公五年，楚子率诸侯讨伐吴国，吴王派弟弟蹶由“犒师”，由于蹶由辞说得体，不仅使其免于“衅鼓”，而且使楚子知道吴国准备充分，最后率军归国。由此可见，辞令在这些时刻就起到了武力所起不到的作用。

《左传》中还记有靠辞令取得道义上胜利的例子。襄公十四年，范宣子把诸侯事晋不如从前的状况归咎于姜戎氏“言语漏泄”，想扣押戎子驹支，不让他参加第二天的盟会，并且当庭斥责戎子驹支：“来！姜戎氏……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面对范宣子气势汹汹的无理指责，戎子驹支逐一加以驳斥：“昔秦人负恃其众……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最后竟赋《青蝇》而退。戎子驹支辞婉理直，使范宣子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得道歉，让其“即事于会”。

作为行人，辞令是其行走诸侯之间的主要工具，如果没有高超的语言艺术或广博的知识，就不称职，甚至遭到他人的斥责。如《左传》昭公十五年，晋文伯到周参加穆后的葬礼，周景王向文伯求彝器，文伯无词答对，而随行人籍谈说了一番不当的话，被景王斥为：“数典而忘其祖。”由此可以看出行人辞令在春秋时

代的重要作用。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别具特色，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评论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5]的确，行人辞令言近旨远、辞简义深、委婉含蓄、雍容典雅，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应对语言的典范，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后世的佳作。

《左传》中行人辞令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揣摩心理，设意迎合

《韩非子·说难篇》有言曰：“凡说之难，在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它说明在说服别人时要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投其所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春秋之时，礼乐崩坏，更增加了人们对“德”的强调和要求，人们往往用“德”来衡量别人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被谴责失“德”，在当时是一种极不荣誉的评价，所以春秋诸侯都企图以厚德自饰，具有强烈的虚荣心。他们希望自己名高，但又不喜欢别人太直露的虚美，而行人正抓住这一点，隐晦曲折地展开心理战术。如《左传》僖公十五年晋阴饴甥与秦伯的对话：

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平？”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怒，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

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这次对话发生在秦、晋“韩之战”刚刚结束，晋惠公被俘之后。阴饴甥代表晋国与秦国盟于王城。当时秦穆公有争霸中原之心，这次战争的获胜使他的信心倍增，故十分得意。但过去秦晋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秦国曾多次帮助过晋国，现在秦穆公不想弃德结怨。并且，要想成为诸侯主，必须有宽广的胸襟，令诸侯敬服。阴饴甥对此早已揣摩透彻，所以在交涉中，他一方面借小人之口道出了晋国人对秦国的愤怒情绪和报仇决心，表现出对秦国的极大不满；另一方面，借秦穆公好大喜功，喜欢听名高之辞这一心理，把秦穆公置于受君子称道厚德之君的地位，在君子的眼中，秦穆公俨然是位英明的霸主了，这使秦穆公别无选择，不得不释放晋惠公。阴饴甥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心理攻势。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齐师时，主要从齐孝公想率桓之功、复兴齐桓霸业的心理入手，使齐侯退兵。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楚子问鼎、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捷都是依靠细致入微地分析对方心理而措辞，使对方心服口服最终获胜的。

二、委婉其辞，隐晦其说

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说：“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这又指出了行人辞令的一个特色：委婉、委曲，把所表达的意思蕴涵于辞令之中，让对方去体会、品味。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国驻守在郑国的杞子让秦穆公派兵偷袭郑国，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不料在秦军前进的路上，被郑国的商人弦高得知，迅速把消息传回国内。郑人发现居住在客馆

的秦人“束载、厉兵、秣马”，于是派皇武子驱逐他们。皇武子来到宾馆后，并没有声色俱厉地揭露他们的阴谋，而是非常委婉地说：“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皇武子把秦人“束载、厉兵、秣马”的行为说成是要打行李回国，并且表示挽留，但言语中又透露出知道他们诡计的含义。秦人听后恐惧异常，立即逃出郑国。

《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时齐人的挑战辞令亦是非常委曲、隐晦。

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齐国行人把晋军的人侵说成是“辱于敝邑”，把约定第二天决战说成是“诘朝请见”，似乎千军万马的血腥厮杀是二人朋友式的亲切拜访，这样委婉的两军阵前的对话的确使后人惊叹。晋国行人辞令也毫不逊色，他把军事上的进攻说成是“使群臣请于大国”，把晋君速战速决的命令说成是“无令舆师淹于君地”，把坚决进军说成“能进不能退”等等。

三、高谈雄辩，滔滔不绝

唐韩愈在《进学解》中称“左氏浮夸”，晋范宁在其《谷梁传集解自序》中称《左传》“艳而富”，这在辞令方面指的是行人的高谈阔论，雄辩有力。

《左传》昭公三十年，郑游吉如晋吊唁晋顷公，晋人认为郑献公应该亲自吊丧，于是派人质问游吉。游吉毫不客气地加以反

驳：

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责，与其备不虞之患，岂忘共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患，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今大夫曰：“女盍从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

游吉指出，晋君得到诸侯拥护是因为晋国奉行礼。奉行礼就必须做到小国事奉大国的同时，大国也保护小国，这才是真正的礼。在郑国与晋国的关系上，郑国事奉晋国已做到了“共其职责，与其备不虞之患”，言外之意，晋国对郑国远没尽到“大字小”之责。游吉紧接着又说明了按照先王之制，郑国于晋吊丧之礼完全符合，而且还高于标准。并且，礼数有丰有简，如果从其丰，则国君年幼，无法成行，所以只有从其简，自己前来，这是合情合礼的，所以，晋国不应苛责郑国。游吉的回答有理有据、辞锋犀利，终使晋人“不能诘”。

《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是《左传》中最长的一篇行人辞令，也是最能充分体现春秋行人滔滔雄辩语言风格的一篇说辞。晋侯派吕相与晋国绝交的原因是由于秦国背弃盟约，率狄、楚攻打晋国。晋厉公气愤异常，决定派吕相去秦国断绝关系。吕相绝秦的内容颇具雄辩性，其全篇言己之是，责秦之非，不容辩驳，不容质疑。有些地方甚至夸大其辞，掩盖真相。如韩之战本是晋惠公背信弃义引起秦国讨伐，而吕相却说秦国“不能成大勋”，把责任推给秦国；把秦国纳公子重耳归国说成是秦穆公“悔于厥心”，把晋文公伐郑报仇说成是郑国侵秦；把崤之战时晋伏击秦军归咎于秦国“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等。吕相